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古村落旅游地 居民生计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

—以云南诺邓古村为例

胡安安, 王斐, 甘雪娜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 上海 200433)

提 要: 旅游地居民生计演化是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文中基于行动者网络,以诺邓古村作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生计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 1) 诺邓古村经历了传统农业、农业主导下旅游兼业化、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三个生计演化阶段。2) 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诺邓古村的异质行动者发生了重组,乡村设施、旅游产品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促使古村生计模式发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3) 地方禀赋、自强化机制构成了诺邓古村生计演化的内在条件和动力,政策契机是古村落生计演化的诱发因素和外部机遇,关键行动者主导着古村生计演化的方向。各异质行动者间相互作用、相互构建,共同推进诺邓古村的发展演化。研究详细论证了政府与社区之间相互协同,共同发挥各自作用,能够更有效地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古村落旅游; 生计演化; 行动者网络;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04.8; F590

文献标识码: A

古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传承载体,是乡村扶贫与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对象,而乡村旅游,凭借显著的惠民效应,构筑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坚实纽带。古村落与乡村旅游两者的结合已成为推动产业振兴,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促进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1]。21世纪以来,古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旅游开发对古村落发展的影响^[2-3]。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古村落内外部互动愈加频繁,呈现出“社区”与“景区”的双重属性,当地的产业结构、社会网络、生计方式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4]。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正逐步嵌入当地居民的生计系统中,对当地居民生计发展产生影响^[5]。由于旅游参与主体角色和目标的动态变化,居民生计也呈现出阶段性差异^[6]。因此,以参与旅游的主体为切入点,关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及其关联性,探究旅游地生计演化的过程和机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重要议题。

生计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包含生存所需的能力、资产和活动^[7],其可持续性在于能否有效应对压力与冲击、迅速恢复、为其他生计创造净收益,且不对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逆损害^[8]。乡村地区的旅游开发为居民带来新的生计资本与策略,这些生计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伴随着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展现了乡村转型的动态性与复杂性^[9]。然而,目前乡村旅游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10]以及生计结果的静态效应^[11],对于旅游发展路径内外因素如何交织作用、不同阶段下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如何发生、乡村旅游生计如何发展演化等尚缺乏系统性分析。鉴于

* 收稿日期: 2024-10-14; 修回日期: 2025-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405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9BGL031)资助。

作者简介: 胡安安(1980-),男,汉族,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老年人信息技术使用、养老旅游、旅游数据开放与治理方面的研究。E-mail: huanan@fudan.edu.cn

通讯作者: 甘雪娜(1999-),女,汉族,江西宜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旅游、旅游者行为方面的研究。

E-mail: 2074180349@qq.com

此,文中以云南诺邓古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通过内容分析法剖析古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生计的动态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探讨多主体参与下社会关系在旅游开发中的重构过程,以期丰富古村落生计演化的理论内涵,为古村落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诺邓古村位于大理州云龙县,依山而建,距今已有 1146 年历史,保留着人提马驮的传统运输方式。村内核心景观面积为 1.2km²,至 2022 年末,全村共有 418 户,1050 人。诺邓古村曾因盐而兴,后随着盐业的衰退与停产,村民主要生计逐渐转向玉米种植和黑猪养殖。自 2000 年起,依托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诺邓古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但旅游产品单一、管理混乱等问题限制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无法满足居民的生计补充需求。在此背景下,古村开始探索市场化的旅游发展路径。2017 年,古村启动 4A 级景区建设工作,政府引导招商引资,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打造“文旅休闲康养目的地”。2022 年,诺邓古村接待游客量突破 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益 2.76 亿元。截至 2024 年 8 月,村内开办了 34 家客栈,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的农户已超过 200 户。此外,诺邓火腿作为县域特色产业,促进了农业种植、生猪养殖、火腿加工销售、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据统计,村内火腿厂和养殖厂建立的就业帮扶车间,共计吸纳劳动力 153 人、临时用工 18000 多人次。

1.2 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在 2024 年 2 月-12 月期间多次对诺邓古村开展实地调研,采用非参与式观察和开放式访谈等方法获取资料。此外,团队还利用相关平台的网络文本对资料进行交叉验证和补充。具体数据如下:1) 深度访谈 56 人次。2) 非参与式观察影像记录 184 份。3) 政策文本和新闻材料 328 篇。共计收集资料 568 份,基本信息(表 1)。

表 1 诺邓古村生计演化资料来源
Table 1 Sources of livelihood evolution data for Nuodeng village

资料类型	资料分类	访谈对象/来源	数量
访谈资料	深度访谈	本地村民、个体民宿和餐饮经营者、村委、火腿厂工作人员	56 份
二手资料	政策文件	全国性和云南省关于“新农村建设”“古村落保护”“减免增值税”等政策文件	21 篇
	官网资料	云南省官网、云龙政府官网、中国云龙网、《大理日报》、云南省文旅局等网站关于“诺邓古村”的资料	307 篇
非参与式观察	影像记录	现场拍摄资料的诺邓古村相关照片与资料	184 份

1.3 研究理论基础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 Network Theory, ANT)关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动,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构建及共同演化过程^[12],核心要素包括: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广义对称原则(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行动者)、转译。转译作为 ANT 的核心,揭示了两个及以上不同事物由于相同的利益点而趋于一致,并吸引潜在行动者、引导注意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行动者建立了共同目标或利益,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环节,构建出相关的行动者网络^[13]。其中,问题呈现指主要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关注点提升为共同焦点,使其成为整个网络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利益赋予是指围绕 OPP,强化行动者在问题化过程中所界定的角色和与其他行动者间的社会关联;征召是指其他行动者接受被界定的角色并成为成员;动员是指行动者承担角色任务并付诸行动^[14]。

诺邓古村通过发展旅游实现生计转变,涉及多主体的关系变化及自然人文等异质因素的动态交互。ANT 通过转译机制描述各行动者间的相互影响,清晰呈现多元行动者的角色、互动关系及动态变化过程,能为诺邓古村旅游发展下的生计演化提供全新分析框架。因此,文中旨在运用 ANT 框架,深入剖析诺邓古村旅游发展下的生计转变过程,识别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动态变化,探讨异质因素如何被纳入网络,以及行动者间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生计模式,揭示诺邓古村旅游发展下生计演化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

2 结果分析

2.1 诺邓古村生计演化阶段

作为较早开发旅游的古村落,诺邓古村在 1992 年诺邓盐正式停产后,凭借保存完整的明清建筑资源

以及独特的盐井文化,踏上了乡村旅游与诺邓火腿特色产业化并进的转型之路。在这一过程,诺邓居民生计经历了传统农业、农业主导下旅游兼业化和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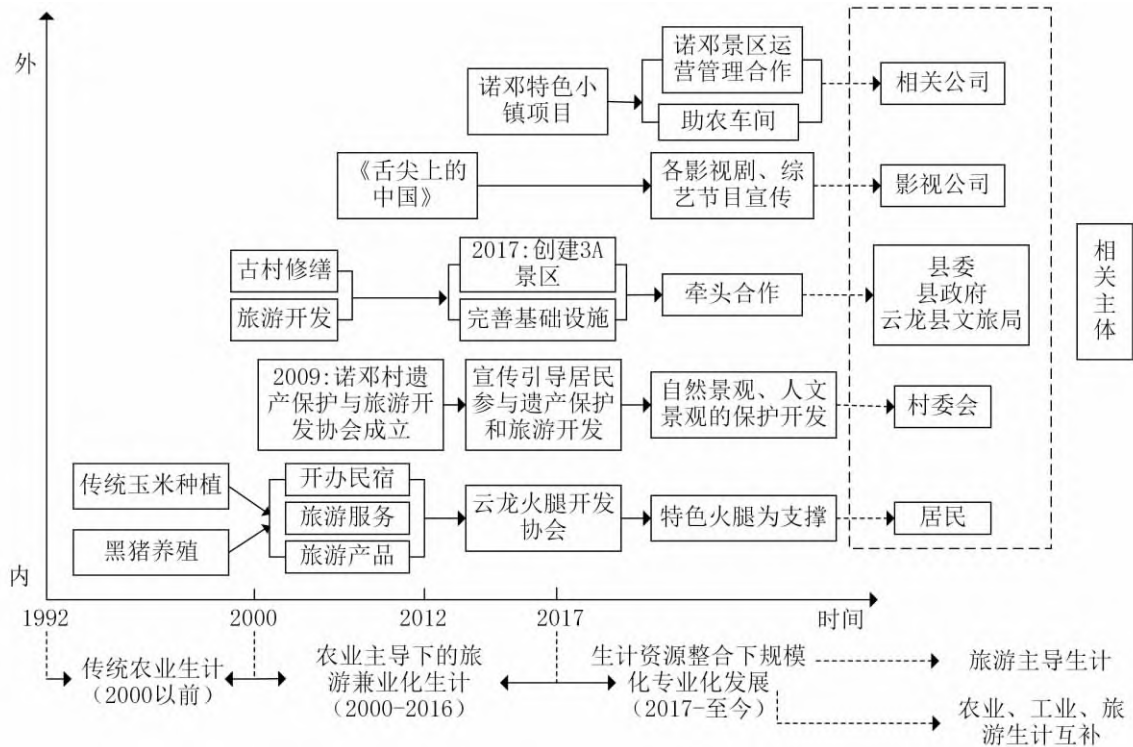


图1 诺邓古村生计演化发展

Figure 1 The livelihood evolution of Nuodeng village

传统农业阶段(2000年以前),诺邓古村居民的生计来源以玉米种植和黑猪养殖为主,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均质化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存在着产业单一、劳动人口流失和乡村贫困等问题。

农业主导下旅游兼业化阶段(2000至2016年),云龙县政府顺应新农村建设要求,利用诺邓古村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推动诺邓古村形成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乡村复合体^[15],居民生计逐渐转向以农业为主导的旅游兼业化。这一时期,旅游经营活动多由村内老人和妇女进行,男性多外出务工,缺乏旅游资源的农户继续从事农业,村内生计仍以农业为主。旅游业发展、外来民宿主和游客的入驻以及部分居民的外迁,打破了古村原有社会网络,以业缘为主的新型熟人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并不断拓展,成为除血缘和地缘外的重要社会联结纽带^[16]。

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借助创建4A级景区的契机,诺邓古村在政府引导和企业参与下,深入挖掘盐井、古民居等资源,形成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景观资源为载体、特色火腿产业为支撑的发展体系,居民生计逐渐整合发展。诺邓火腿产业实现了从小规模、单品类向大规模、多品类的跨越式发展,当地黑猪养殖业、农家乐和餐饮业也得到了推动。游客需求的变化、外来民宿主和当地发展精英带来的新业务丰富了农户的生计选择,推动了当地生计资源的整合和优化。诺邓古村成功构建了以乡村旅游为主导,农业、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2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诺邓古村旅游生计转型过程

2.2.1 传统农业阶段

在盐业衰退后的传统农业转型阶段,诺邓古村的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村民、猪肉零售商、村委会、云龙县政府等,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土地、玉米、黑猪等。随着低价海盐的大规模流通,诺邓盐逐渐失去经济地位并走向停产,诺邓传统优势资源的经济地位逐渐式微。此外,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大量居民开始外迁。在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的双重压力下,古村网络的必经之点可概括为“依托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流动,维持基础生计”。

为了维持基本生计,村民通过种养农作物-饲养牲畜-售卖牲畜的传统农业模式获取收益,“种玉米收回来以后喂猪,猪大了就给县城里卖猪肉的人打电话……每个人卖的老板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渠道。”(A23)部分村民在农闲时从事临时性非农业劳务活动以增加收入。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合作机制,各主体间联系松散,资源分散且利用率较低,“都是各顾各家,没有什么合作统筹。”(A21)政府虽然曾尝试组织集体性核桃和大豆种植等活动,但因收益周期长、短期效益不明显,未取得显著成效,村民对政府也未形成充分的信任。

因此,在传统农业阶段,诺邓古村各主体间的生计活动相对孤立,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合作,尚未建立起成熟的行动者网络,具体表现为:行动者主体数量有限,关键行动者尚未形成,网络结构简单且密度低,覆盖范围有限,资源集中利用率低。面对贫困问题,诺邓古村急需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2.2.2 农业主导下的旅游兼业化生计阶段

(1) 行动者构成。在传统农业向农业主导下的旅游兼业化转型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推动构建相关行动者网络,其中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云龙县政府、诺邓村委会、村民和剧组等,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诺邓古村的传统民居建筑、景观资源、盐文化等。

(2) 行动者网络转译。1) 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转译中都有其自身利益关注点,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调整。人类行动者方面,云龙县政府希望通过旅游开发解决居民流失和传统农业收益有限的问题,提升古村发展水平;村委会希望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对外交通可达性弱的现状。“这边以前没有路,从半山上走才有下去的一条路,去县城要一个半小时左右。”(A28)村民则希望通过旅游发展改善生活环境、拓宽生计来源,解决劳动力结构低质和房屋土地空置问题。“没有搞旅游的时候,条件相当困难,大家都出去打工,留在这里的基本上就是老的、小的。”(A32)剧组希望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取景点,在有效传达剧本理念的同时传播乡土文化。非人类行动者方面,古村内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处于未开发或待开发状态,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其潜在价值亟待挖掘与提升。“以前明清建筑有130多个,后面没人管,翻修技术不成熟,有一些被破坏了。”(A38)因此,如何增加古村的经济活力,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并实现发展目标,可归结于“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这一共同联结点。2) 征召与动员。地方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将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一致化,并通过动员、征召和被征召等方式动员更多行动者加入诺邓古村旅游发展的网络联盟中。具体征召方式包括:①行政征召:为响应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云龙县在“十五”规划中提出把旅游业培植为支柱产业,并下设“诺邓保护与利用领导小组”对古村的开发保护工作实施管理和指导;2009年,古村创建诺邓村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会,依托村民自治管理来推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发项目的落实,“那段时间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发动群众,多数客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办的,《舌尖上的中国》也是这个工作组联系的。”(A5)2010年出台《云龙诺邓古村旅游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对诺邓古村项目开发进行了详细分项规划。②经济征召:云龙县委政府投资6260万元用于路道恢复、古建筑抢修、火腿厂搬迁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低息信贷支持,扶持有一定基础的特色旅游餐饮、火腿加工、旅游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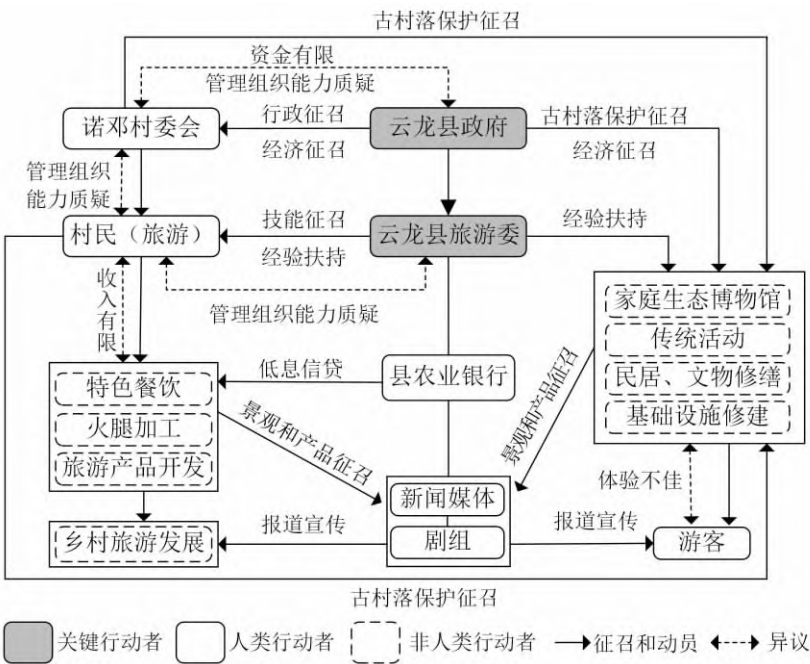


图2 诺邓古村农业主导下的旅游兼业化生计阶段行动者网络
Figure 2 The actor network for the livestock in the stage of agriculture - dominated part - timing tourism for Nuodeng village

邓古村项目开发进行了详细分项规划。②经济征召:云龙县委政府投资6260万元用于路道恢复、古建筑抢修、火腿厂搬迁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低息信贷支持,扶持有一定基础的特色旅游餐饮、火腿加工、旅游产

品开发等综合服务业。③古村落保护征召:云龙县政府对古村可移动文物登记造册,指导建立“家庭生态博物馆”,牵头编制完成《诺邓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对古村文物及历史风貌进行保护和维修。“房子烂了不修也是不行的,但自己修有时候国家也是不允许的,因为是古村要保护,政府有时候就会派人来修”(A6)村内同时成立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恢复诺邓民间祭孔、传统村落集市等传统活动。④景观和产品征召:完整的古村风貌及独具特色的诺邓火腿吸引了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报道,《遥远的诺邓》《舌尖上的中国》等多个剧组前来取景拍摄。⑤技能征召:县政府免费对居民进行旅游经营、火腿制作、刺绣等方面的技能指导,组织村民到剑川、沙溪等地实地考察学习,将村民征召到行动者网络中(图2)。“社保局有培训的任务,经常培训服务行业的东西,我们都是免费去学。”(A5)

(3)异议。在诺邓古村农旅兼业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村民、村委、民宿主、游客等行动者之间存在诸多异议,涉及资源分配、管理规范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导致网络呈现不稳定状态。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需求,加之资金透明度不足、薪酬拖欠及资源浪费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与权威性。“也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花在哪了。他们那些工头实际上做出来的工程不值这么多钱。”(A5)民宿多由居民住所改造而成,规模小、配套设施不全,民宿主的管理经验不足、服务意识薄弱,难以满足游客需求。“政府也不教我们怎么管理,现在游客又不像以前有得住就行,很多都不能达到游客需求。”(A10)再者,受限古村保护要求,村民经济活动多局限于低附加值的行李搬运、导游讲解等旅游服务及诺邓火腿等特色产品销售,收入渠道狭窄且不稳定,“开摩的和面包车接送游客,有的赶马为游客驮行李,火腿挂着也卖不掉。”(A10)尽管在这一阶段,《舌尖上的中国》带动了诺邓火腿的短期销量,但原料来源和工艺单一、家庭作坊式生产等制约了产业发展,产品单一性和区域市场局限性也限制了火腿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对农户脱贫的带动作用。

由于云龙县政府、村委会等关键行动者未能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加之各行动者间的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调节,诺邓古村农旅兼业化生计阶段的行动者网络稳定性逐步降低。为了适应发展需求,重构行动者网络成为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新的行动者进入,新的网络开始生成。

2.2.3 生计资源整合下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阶段

(1)行动者主体转变。随着各主体间矛盾加剧,政府的单一主导力量被削弱,市场化运作凭借商业资本优势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满足古村发展和市场需求,云龙县政府和企业合作,共同制定发展模式,非人类行动者如诺邓火腿厂、电商平台、游憩景观和设施等也加入网络建构中。在新的发展阶段,各异质行动者提出了新诉求:云龙县政府希望依托企业管理,将诺邓建设成大理西部精品景区。村委希望规范旅游开发活动,优化社会环境。以火腿厂老板为主的村内发展精英希望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投资回报。旅游企业希望通过制度和资金帮扶,帮助农户掌握行业规范,推动黑猪养殖、火腿加工及旅游业等多产业联动发展,实现可持续收益。在这一阶段,古村行动者网络的必经之点转变为“提升旅游经济效益,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2)行动者网络再转译。随着电网改造、公路修建等项目的完成以及旅游知名度的提升,诺邓古村的招商环境显著改善,县政府积极与企业合作,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扩充古村生计路径,各异质行动者重新征召和被征召。1)行政征召:2017年诺邓被列入《云南省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后,县政府先后与大理州旅游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旅投旅游资源开发和云龙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2019年新电商拼多多在政府的征召下,通过沪滇合作平台帮扶诺邓火腿“助农车间”落地,助力现代化产业链建设。2)经济征召:村内发展精英通过旅游活动实现经济收益显著提升,对其他村民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些精英基于社会熟人网络关系,征召村内外居民参与到古村生计网络中。“火腿厂忙的时候会叫熟人来帮忙,请些村里的小工,外村的也有。”(A34)当地税务部门和农商行通过税收减免、贷款便利化和降息等举措,征召居民参与旅游开发。3)技能征召:2015年县政府投入130万完成电网改造,与拼多多合作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培养电商人才。“网上卖东西这些宣讲会,讲一些经验交流,不懂的可以去学习。”(A11)4)景观征召:2023年,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为古村带来一波旅游热潮,古村的知名度扩大。“去年《去有风的地方》有几个取景地就是在海坪拍的,又把诺邓带火了一次。”(A31)通过上述的征召动员,诺邓古村进入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阶段,新的行动者网络得以形成(图3)。

2.2.4 诺邓古村行动者网络转变过程

在诺邓古村的旅游发展过程中,行动者异议促成了行动者重组、OPP转化以及主要行动者的重新征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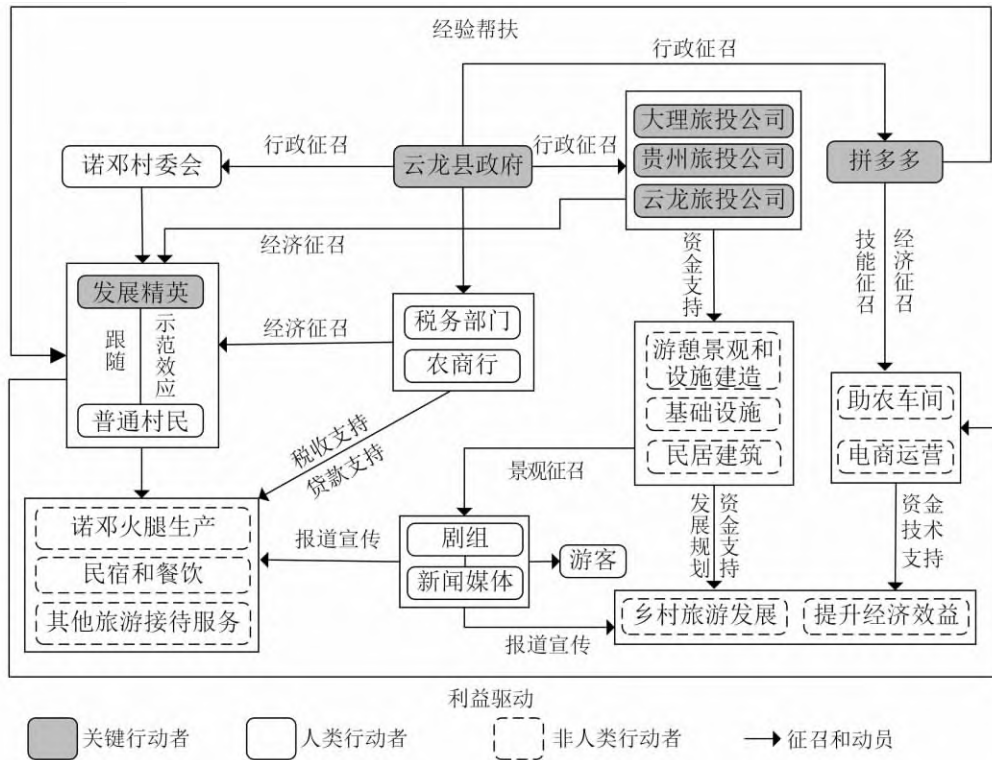


图 3 生计资源整合发展阶段行动者网络

Figure 3 The actor network for the stage of large-scal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livelihood resources in Nuodeng village

和动员,推动古村居民生计从传统农业到农业主导下旅游兼业化,再向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转变(图4)。

在盐业停产引发古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大量居民外迁,剩余居民则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勉强维持基本生计。“盐厂停产以后,我们村就没有大的经济来源,大伙都没钱,只能去种玉米开山,不开荒就饿死了。”(A29)此时,诺邓古村尚未建立起成熟有效的行动者网络,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收益低风险高、居民贫困与劳动力流失等异议凸显,制约了古村经济的发展。

为了解决异议和摆脱贫困,政府主导探索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纳入媒体、传统民居建筑、景观资源等新行动者,逐步形成农业主导下旅游兼业化的生计网络,OPP转变为“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然而,随着乡村旅游的初步发展,收入有限、资金短缺、规范化管理不足、游客体验不佳等矛盾显现,削弱了网络稳定性,成为制约古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原来是政府给我们发工资,但是后面它付不出钱来,差不多两年都没给我们发工资。”(A26)“当时住的虽然有几家但是没有卫生间,条件艰苦,很多人都适应不了。”(A7)这些异议削弱了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成为制约古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为了应对异议并满足古村发展需求,政府借助政策资源征召企业,并动员当地发展精英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围绕“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的共同目标展开行动,推动诺邓古村向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转型。“2019年9月份诺邓火腿食品厂在检槽建立了五个诺邓黑猪原生态放养基地,和接近300户建档立卡户签订脱贫协议,在检槽建立火腿腌制车间的群众收入有180多万元。”(A38)在此过程中,诺邓古村生计行动者网络实现了再转译与升级,促进了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充分证明了有效的行动者网络在引导居民生计演化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2.3 诺邓古村旅游地生计转型驱动机制

2.3.1 地方要素:转型基石

诺邓古村的地方资源是生计演化的基础条件,经济发展的滞后为传统文化和民居风貌的保存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家都穷,没有钱去修复房屋,所以这个村子才能传承和保护下来。”(A29)研究表明,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人地关系多围绕地理资源展开^[17],农户通常根据资源禀赋的变化调整生计策略。诺邓古村以白族原生态文化、盐文化及儒释道三教文化为特色,现存100多座古民居院落和8处古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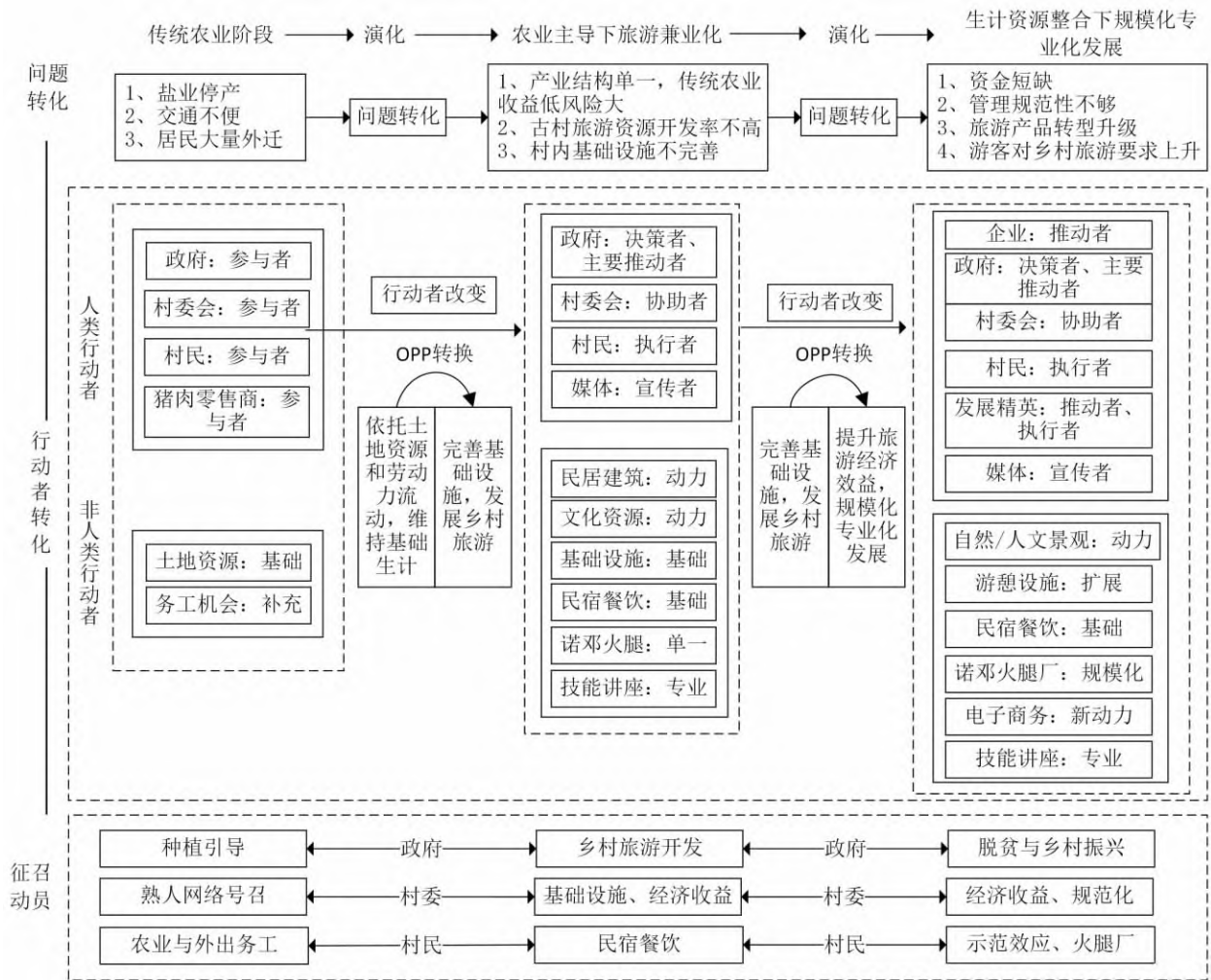


图4 诺邓古村行动者网络转变

Figure 4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tor network for Nuodeng village

筑群,洞经古乐、地方戏曲“吹吹腔”等原生态的山地白族文化也流传至今。借助这些具有完整性、显著民族特色和极高历史价值的地方资源,旅游开发成为古村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2.3.2 自强化机制:内生动力

村民生计的自强化是转型发展的内驱动力。随着诺邓盐业的衰落,古村居民经济活动转向农业和外出务工,但有限的收入难以满足经济需求。二十一世纪初,大理与丽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诺邓古村提供了借鉴,鼓舞诺邓居民投身于旅游行业。“我和支部书记和几个民宿主去丽江考察,回来后就办了小博物馆还有客栈,大家看着赚钱就也办起来了。”(A28)随着游客增多与经济收益持续增加,居民在获得积极情感体验的同时,对旅游发展路径进一步自强化。旅游发展后期,生计资本趋向整合发展:民宿主和火腿厂工作人员的自然资本逐渐向生计资本整合,缺少相关生产要素的农民则继续扩大自然资本。生计资本的整合增加了居民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了生计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3.3 政策契机:外部诱因

乡村旅游发展、新农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政策导向是诺邓古村生计转型的重要外部诱因。2005年中央发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保护古村落和古民宅,云南省随后推进新农村建设。诺邓古村积极响应政策,实施了退校还寺、修缮庙宇、重建古盐井房等一系列措施。云龙县出台旅游项目规划,启动实施古村旁山地农牧区的开发建设,推动诺邓古村旅游开发进入系统化、精细化发展阶段。此外,县政府通过多部门联动,先后开展“诺邓古镇特色小镇保护利用项目”“诺邓景区投资运营管理合作”及“专债项目”,以期将诺邓古村建设成“慢生活旅游”目的地。这些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调整

为生计转型提供了外部机遇,推动新生计路径的生成。

2.3.4 关键行动者交替:主导阶段演化

在诺邓古村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凭借强大的权威性和决策力,直接引导着发展路径。“政府说可以种核桃,大家就都去种核桃,现在那些核桃树荒着也舍不得砍。”(A6)“有专家来考察过说可以发展旅游,政府就组织动员。”(A23)但“上传下达”的权力关系结构使得居民被排斥在决策之外,诉求和地位边缘化,参与感与归属感被削弱,“政府天天组织开会,都是他们已经决定好了,就是通知你,有些时候我们都晓不得。”(A32)为了解决上述权力关系导致的政策与需求脱节及资源错配问题,以及防止相关行动者退出,诺邓古村征召企业作为新的关键行动者。随着企业介入与乡村精英崛起,形成了企业、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格局。新的关键行动者通过关系嵌入和资源整合,推动古村生计资源的整合和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归纳而言,关键行动者主导着发展演化方向,各利益主体关系的动态变化推动了古村生计路径的创造和演变。

综上所述,诺邓古村旅游地生计转型的驱动机制是一个多维综合系统,其核心要素包括地方资源禀赋、内生自强化效应、政策导向作用及关键行动者交替,这些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生计路径的动态演变。

3 讨论

(1) 村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体现是村庄原真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先前研究强调了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宏观引导及其与社区协同作用的重要性^[18],但在诺邓古村案例中,初期阶段政府与社区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社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居民并不总能获得实质性收益^[19],行动者网络内部产生矛盾异议。村委会和村民丧失话语权的负面影响在旅游发展中后期逐渐凸显,影响旅游发展进程的推进。“(政府)让我们在停车场收费,平时来的多数都是来帮我们(村)发展的,那些人肯定不干了嘛,‘我来帮你发展规划你还收我的停车钱’。”(A10)同时,古村生计和社会关系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外部资源,政策和企业投资仍是主要推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探索内生发展模式,激发村民积极性,推动当地人才向新型农民转型。此外,可探索推行“弱政治化”模式,优化多元主体的权力资源分配,发挥村民与村干部的主体作用,提升社区自主管理能力。同时,平衡上级规定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构建多元高效的治理格局,以社区驱动旅游发展,增强农村内生动力。

(2)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诺邓古村生计模式经历了深层次的结构变化,伴随着乡村设施、旅游产品与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以及异质行动者的重新组合。旅游业和商业文化的渗透,打破了古村原有的空间和生产模式,使其从传统农业主导型乡村社区,转变为旅游发展下生计专业化、规模化的新型乡村。在此过程中,居民在尊重与利用本土资源的同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愿景的生活与生计方式。“他们原来也在外打工,后面旅游发展起来就回来办民宿,一家人在一起多好。”(A33) ANT理论阐释了诺邓古村作为村民生活与生产空间以及游客消费场所,通过异质行动者的互动,形成了动态变化的复杂网络。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有效动员了村民、发展精英、企业、自然景观等多种主体,共同推动生计转型和乡村振兴。然而,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转换过程中,网络关系表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政府和当地社区等行动者在网络建设中的作用,以找到更为可行的“必经之点”,促进可持续生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

4 结论

文中运用实地调研、非参与式观察、开放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云南诺邓古村为案例地,依托行动者网络,探讨古村生计发展的演变过程和演变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 诺邓居民的生计模式经历了传统农业、农业主导下的旅游兼业化和生计资源整合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这一转型标志着居民生计资本的全面整合与优化配置,展现出居民高度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其生计策略从单一依赖转向多元化发展。

(2) ANT分析表明,政府、企业、村民、媒体、旅游资源等异质行动者,在利益赋予与征召动员下,共同缔结成诺邓生计演化的复杂行动者网络。随着旅游发展与生计转型的推进,行动者的主导角色从政府引领,逐渐演变为政府与企业共同主导;OPP经历了“依托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流动,维持基础生计”向“完善

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转变,再向“提升旅游经济效益,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型反映了当地生计模式和网络内部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的动态调整,为理解农村生计转型与旅游发展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

(3) 诺邓古村旅游发展下的生计演化主要受到地方要素、自强化机制、政策契机与关键行动者更替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驱动。具体而言,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构成了生计模式转型的基础。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等政策性契机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支持。村民在旅游经济收益带来的自强化机制与正向反馈循环中构成了内驱动力。关键行动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交替主导,推动了生计发展路径的多元化探索,深刻影响了古村的整体发展方向与节奏。

参考文献

- [1] 朱焯伯, 喻兴洁, 张家其. 乡村振兴视域下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空间结构探析 - 以湘西州为例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23(5): 96 - 105. [ZHU X B, YU X J, ZHANG J Q. A 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spati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23(5): 96 - 105.]
- [2] 田磊, 刘亚彤, 吕丹, 等.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 A 级景区空间组合格局及互动作用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7): 182 - 191. [TIAN L, LIU Y T, LV D, et al. Spatial combination patter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class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7): 182 - 191.]
- [3] 唐夕汐, 夏青, 田里. “城市更新 + 文旅”的城市孤岛空间多维拓扑结构与功能重塑研究 - 以广州市黄埔古村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1): 69 - 74. [TANG X X, XIA Q, TIAN L. Multidimensional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island space characterized by "urban renewal + cult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uangpu village in Guangzhou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1): 69 - 74.]
- [4] 王思雅, 孙九霞. 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的双向驱动机制 - 以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7): 1531 - 1547. [WANG S Y, SUN J X. Bidirectional mechanisms of tourism resource (r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 case study of Erhai Lake region, Yunn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7): 1531 - 1547.]
- [5] 张朝枝, 李子帅. 资源保护对景区内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 - 以广东丹霞山为例 [J]. 经济地理, 2024, 44(7): 206 - 213. [ZHANG C Z, LI Z S. Impact mechanism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in scenic area: A case study of Danxia mountain scenic area in Guangdong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7): 206 - 213.]
- [6] 张志明, 陈海鹰, 戴健驰, 等.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 - 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J]. 旅游学刊, 2023, 38(7): 97 - 112. [ZHANG Z M, CHEN H Y, DAI J C, et 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livelihood path evolution and its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Longlin village, Haikou [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7): 97 - 112.]
- [7] 纳列什·辛格, 乔纳森·吉尔曼. 让生计可持续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0, 17(4): 123 - 129. [SINGH N, GILMAN Q. Making livelihoods more sustainable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Chinese Edition), 2000, 17(4): 123 - 129.]
- [8]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5 - 6.
- [9] YEAGER E P, SOULARD J, DEALE C, et al. Rural resiliency through peer-to-peer accommodation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3, 32(7): 1392 - 1412.
- [10] 段雪岩, 黄志强. 生态旅游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 以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7): 48 - 56. [DUAN X Y, HUANG Z Q. Farmer's willingness to change livelihood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ing ecotourism - Case study in Lu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3, 37(7): 48 - 56.]
- [11] 张瑾, 王婷, 吴晶, 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545 - 560. [ZHANG J, WANG T, WU J, et al. Research on the farmers' livelihood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545 - 560.]
- [12] LATOUR B. On recalling ANT [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47(1): 15 - 25.
- [13] 胡宪洋, 花菲菲. 西安典型旅游村落的景观特质 - 以上王村和家佛堂村为例的网络结构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4(2): 202 - 208. [HU X Y, HUA F F.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s in Xi'an by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34(2): 202 - 208.]
- [14] TOMAZOS K, MURDY S. Exploring actor-network theory in a volunteer tourism context: A delicate balance disrupted by covid-19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3, 56: 186 - 196.
- [15] 张园林, 刘玉亭, 马丁·菲利普斯. 乡村空间转型研究的中西比较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1): 53 - 61. [ZHANG Y L, LIU Y T, PHILLIPS M.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tudy of rural space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11): 53 - 61.]
- [16] 乔浩浩, 王朝辉, 胡云云, 等. 旅游嵌入视角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 [J]. 人文地理, 2023, 38(5): 44 - 52. [QIAO H H, WANG Z H, HU Y Y,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embeddedness [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5): 44 - 52.]
- [17] 付孟泽. 人地关系视角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演变与发展研究 - 以浙北地区为例 [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9. [FU M Z. Research on spat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 In case of northern Zhejiang [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19: 44 – 46.]

[18] YUNIKAWATI N A, ISTIQOMAH N, PRIAMBODO M P, et al. Can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CBT) support sustainable tourism in the Osing Traditional Village? [J].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021, 232: 2 – 23.

[19] ACHA – ANYI P N, NDOLOSE L, SOLOMON K P. Rural tourism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Port St. Johns – South Africa [J]. Afric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2021, 10(6) : 1867 – 1881.

Livelihood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for residents in ancient village as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n actor – network theory – based study in Nuodeng village, Yunnan Province

HU Anan, WANG Fei, GAN Xuena

(Department of Tour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resident' s livelihood in tourism destination is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 – actors. Based on the actor – network theory, taking ancient Nuodeng village as a case, the process of livelihood evolution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in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 were explored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Nuodeng villag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livelihood evolu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dominated part – time tourism, large – scal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livelihood resources. 2)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 was a reorganization occurred among heterogeneous actors in Nuodeng villa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acilities, tourism products and social power relations has led to deep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 mode. 3) Local endowment and self – reinforcing mechanism constituted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ivelihood evolution in Nuodeng village. Policy opportunities were the inducing factor and external support for livelihood evolution. Key actors dominated the direction of livelihood evolution. The heterogeneous 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o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Nuodeng villag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yner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with the joint play of their respective roles,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livelihood evolution; actor – network theory; rural revitalization